

## 2. “跨文化”、“超文化”还是“转文化”或其他?<sup>1</sup>

冯东宁

本期论文的难点是术语的翻译,在沈骑<sup>2</sup>的文评中对此已有说明,在此我仅从翻译的角度,继续这一讨论。文章得有一个标题,我们暂且借用文章的关键词——“Transcultural”,因为翻译这一活动的确是处于一种“动态”或“过渡”文化”之中。

术语的形成和被接受有时要通过一个较长时间的磨合。比如文中提到的 cross-cultural、intercultural 和 transcultural 并非新词,但其中文的译法却仍处于一种过渡状态,一个主要原因是中文的前缀非常有限,且用法模糊;而早期的译者有时在翻译时没有使用恰当的策略给予明确的定义。

在英文中, cross-cultural 和 intercultural 混用的情况颇多,在中文中我们也不必太过于谨小慎微,另起炉灶、重新发明轮子。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引起多大的歧义,当然在特殊情况下例外。设想如果将 intercultural 译为“际文化”,那 interracial 怎么办? Intercommunal 呢? Intertextual 又如何翻译?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 transcultural 有其特定的内涵,不但有必要加以区分,而且要明确其定义。译为“超文化”固然是一种策略,以区分于“跨文化”。其实“跨文化”可能跟 transcultural 更贴近,如早期翻译时再加上原文的概念和定义,对 transcultural 来说,不乏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

<sup>1</sup> 《“跨文化”、“超文化”还是“转文化”或其他?》。

<sup>2</sup> 沈骑:《从跨文化、“际文化”到“转文化”研究:兼评〈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全球中国比较研究》,2018年第1期。英文见 *Journal of China 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Vol.2, 1016。

但是位置已被 cross-cultural 占领,人们对其已有约定俗成的共识,想改也难。不幸的是, cross-cultural 和 intercultural 似乎不值得占领这个位置,因为 transcultural 比那两个词的术语性都高,而“跨”这个字不但表达了跨越文化的状态,也包含了一个动态的内涵。

中文是表意文字,很容易望文生义。汉字用得不当,很容易令人产生误解,哪怕是在给出定义的情况下,尤其是一些与政治、社会及文化有关的词汇。所以“超文化”的译法是需要进一步商榷的,“超”字似乎离原概念甚远,有点背道而驰的感觉,而在确立这个词的定义的时候需要极大的力度来说服读者。

有学者把 transcultural 译为“转文化”,认为与其他中文概念有相同的词根 trans,如转型 transformation、转基因 transgenic、转账 transfer、转机等 transit 等。但是, translation (翻译) 没被译成转译, transhimalaya 被译为环喜马拉雅。但是,应该译成什么不能以 trans 已经译成什么作为依据的,英文词缀的意义不仅是转,可以是跨、异型、过渡、及、改、变、横跨等,与其它词根组成新词的机会就更多了。一个例子挺说明问题: trans fat 译成反式脂肪,逆态脂肪,有时有宽译成 不饱和脂肪,偶尔译成“转式脂肪”,不会被译成转脂肪。

所以,译成“转”是偷懒的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首先,应该考虑原词的意思,它是一个动态中的固态表现,其意义应该是离开原点的“移走,变异,游移,异变,转化,转型”,用俗话说,就是两边不着调,单单译成转可能会引起误读,还应该问的问题是,有多少人会在现阶段去查阅原义。所以翻译应该谨慎。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 transcultural 译成转是有点欠考量。其意义应该是“过渡型,转异型/性”文化。

但是,翻译还有个约定俗成的原则,尽管是不完善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译法,被接受了也就是正确的译法了。目前国内外都已经出现媒体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在使用“转文化”,作为一种约定俗成,把 transcultural 译为“转文化”也说得过去。所以不必太过于纠结。

另外,一个可以考虑的有效策略是创造新词 (neologism), 比如把 transcultural 译为“通识文化”,这是一个生造词,一方面它不具有负载 (loadedness) 可以塑造。另一方面,它暗含“共通认知”或“通过认识”之意,另外将 trans 译成“通识”亦可以说这是一个半音译半意译 (phoneto-semantic translation) 的词,便于记忆。当然,这只是一个设想。

社科术语译文的不确定性是难免的,这是语言在不同文化流动过程中

的一个现象。作为术语的翻译的策略和概念的规范，使用术语表 (Glossary) 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例如：

转文化路径 transcultural approach

拓扑图 topology

双向代理人 double agent

文化间代言人 agent of in-between

多元身份 multi-identity

阈限灵活性 liminal flexibility

模糊边界效应 fuzzy border effect

相逢交叉场 cross-field of encounter

阐释型构 interpretative configuration

距离原理 principle of distance

历史性 historicity

镜像效应 mirror effect

权力游戏 power games

表征体系 representation system

主动误解 proactive misunderstanding

积极误解 positive misunderstanding

转文化生成性 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如果用中文给出以上术语的定义或说明，不但给读者提供极大的便利，而又可对术语的理解达成共识，便于学科的发展。

**冯东宁博士** (Dongning Feng)，旅英社会语言学家，翻译学家。曾任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语言及文化学部高级讲师，亚非学院翻译中心主任。先后在中国、日本和英国从事语言、社会科学、翻译学等学科的教学二十余年，并曾任教于英国多所大学。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文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翻译社会学、批判话语分析与翻译及翻译文化学。他发表的作品包括政治文本翻译和专著 *Literature as Political Philosophy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中国文学的政治哲学维度》，2002年)。

[参考文献]

从跨文化、“际文化”到“转文化”研究：兼评  
《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  
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一文<sup>1</sup>

沈 骑

《全球中国比较研究》于2015年第一期刊载了于硕的长篇文章：《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中欧洲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该文首次将“转文化”(transcultural)作为中外社会文化比较研究的一种新的认知途径，视角新颖，时空跨度广阔，史料丰富翔实。但是，阅读完该文，感觉把transcultural一词译为跨文化，似乎不妥，若以“跨文化路径”(transcultural approach)理解，着实窄化，甚至会曲解于文本意。如果译为“转文化”则更能凸现出于文的方法论意义。本文首先简单提及几个相关词汇并概述与transcultural approach相关的几种用法，然后评介于硕对“转文化路径”(transcultural approach)的创造性地使用，之后试图通过区分多学科及多元文化研究、学科间性与文化间性研究、跨学科与跨文化研究，以及超学科研究与转文化研究在概念上的差异，界定“转文化路径”之特点与属性，并对于文提出的认知路径作简要评论。

从“跨文化路径”到“转文化路径”

英文的cross culture、interculture和transculture中文的译法一般都是“跨文化”，鉴于其不同的内涵，为了深化研究，有必要在此加以区分。cross culture译为“跨文化”一般没有争议，interculture和transculture这两个概念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汉语词汇。借用international(国际)的

---

<sup>1</sup> 本文发表于《全球中国比较研究》，2017年第2期。英文见*Journal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Vol.2, 2016。再次发表此文及后面的回应文章于《社科汉语研究》2022年第1期，旨在作为翻译部分的一篇文章的参考文献，请读者结合阅读。

译法，暂且把 *interculture* 译为“际文化”<sup>1</sup>。本人在此将 *transculture* 翻译为“转文化”，而于硕在文章中使用的方法可以归结为广义的“转文化路径”(transcultural approach)。目前，国际上出现了一些“转文化路径”的研究，如超文化的语言学习 (Brady and Shinohara 2000)，应用语言学 (Abad 2014)，心理学 (Remmers 2014)、精神卫生、传媒、音乐、电影、哲学以及性别研究等等<sup>2</sup>。此外，国际学术界有多种领域也使用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转文化视野) 的概念，如超文化视角的教育符号学研究 (Tochon 2013)，社会语言学研究 (Halliday 2007) 以及教育语言学研究 (Hult 2010) 等社会科学领域。

然而，与前者不同的是，于硕尝试建构的是一个“转文化交叉场”(trans-cultural cross-field) 理论，指出思考的可能路径并提供了思想游牧的概念工具。在她发明的一套新概念中最重要的是“跨文化生成性”(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Generativity* 概念从词源上看来自拉丁文的 *generatio* (生成，生育 generate, produce a new individual)，意指“创造性仿照”(modeled on creativity)，美国发展心理学家艾里克森 (Erik Erikson) 最早将这个新词运用于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psychosocial developmental theory)，可以界定为代际之间的创造性的传承 (defined as transition on creativity between the generations) (Erickson 1985:242)。根据于硕的归纳，“生成性是一种自系统能力，可以生产和创造意想不到的变化”(Generativity is a self-system's capacity to produce and create unanticipated change)。这一定义展示给我们的内含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两种能力（生产力和创造力）以及必定引起的变化 (self-contained system, two facets: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change as consequence)。基于自身扎实的历史功底和人类学专业训练，于硕将“生成性”置于文化相遇的“阈限空间”，从而把我们引入了宏大的历史文化场域；在文明相遇的自动进程 (auto-process) 和复杂的跨文化交叉场 (*champs croises*) 中，形成了自系统 (self-system) 的生成性，它拥有巨大的沟通、阐释、理解和创造的跨文化生成能量。

我认为，将 *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译为“转文化生成性”更能涵盖于硕文章的内涵并凸现其方法论和理论建树。于硕通过对 500 年以来中欧相逢的复杂的历史的重新解读，带着对当下“全球社会”的唯一共同体意识

<sup>1</sup> 限于本文的篇幅，以后再论证。

<sup>2</sup>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中、东北欧研究系的 Ostapovich 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见：<http://cen.es.ubc.ca/placeholder-two>。

和关怀以及参与全球公民对话的切身感受,不仅在方法论上超越了已有的“中国”和“世界”的二元视野,执着地将中国置入世界,作为世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加以整体对待,而且在理论上勇于创新,提出了全球化以来社会科学研究必需的跨文化新路,她还为提升和改善中国与其他地区的思想交流和精神对话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真正做到了人文科学理论的有的放矢。可以说,于硕的“转文化生成性”本身就是知识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个成果,是基于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 (people-to-people) 互动交往而提炼形成的一个范式,更是当下学科与学科之间深度交流在社会科学与文化研究领域里应用的一个范例。

### 从“多学科性”到“超学科性”

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背景下,现代科学与研究领域的不不断拓深,学科与学科之间互动日益频繁,出现各种交叉学科和跨学科研究。一系列表征学科交叉、互动与融合不同状态、程度和关系的概念,如多学科性 (multidisciplinarity)、学科间性 (interdisciplinarity)、跨学科性 (crossdisciplinarity),乃至超学科性 (transdisciplinarity) 等术语相继产生。对这些术语的特征与差异的认知有助于我们理解跨文化理解领域的研究方法和途径等重要问题。

首先,多学科性 (multidisciplinarity) 所关注的知识出现在不止一个学科或专业中,因而多学科研究团队的成员来自不同学科和专业。Nicolescu (2010) 在说明多学科性时认为它不仅从一个学科,而是从多个学科研究一个项目,并曾举例如下:对一幅画的研究不仅可以从艺术史,也可从宗教史、欧洲史,或几何学论述;与马克思哲学有关的专业有哲学、物理学、经济学、心理分析或文学等。总之,通过不同学科视角的整合,最终能更好地认识所研究的问题,从而对该学科有进一步了解。同样,本学科的成果也可看作是其他学科的成果 (Stein 2007)。从这个意义上看,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和多语主义 (Multilingualism) 等研究范式也属于多学科性研究的范畴,研究者可以从不同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政治学或是历史学来审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各种文化问题。

第二,学科间性 (interdisciplinarity) 是指不同学科间概念和方法的交流,最后融入不同的、互补的学科中。就知识而言,学科间性指新知识延及至现有学科或职业之间或之上,它既可以不为现有学科接受,也可以为一个、两个、更多学科,以至新建学科接受 (Wikipedia 2012)。Nicolescu

(2002, 2010) 认为学科间性研究不同于多学科研究, 前者关注的是将一个学科的方法移入另一个学科, 人们从应用程度、认知程度以及产生新学科程度三个方面加以区分。多学科性研究中的各学科是相互的、累积的, 但不是互动的, 而学科间研究将不同学科的做法和假设整合在一起。基于这一认识, 我们认为际文化研究 (intercultural approach) 的目的和属性是指不同文化在概念、观念和方法的交流, 提升彼此认知和融合, 形成对两种不同文化理解的第三位置 (Kramsch 1998)。

第三, 跨学科性 (crossdisciplinarity) 旨在研究以一个学科的知识说明另一个学科。因此, 跨学科研究描述采用任何本学科以外的方法、项目和研究活动来研究一个课题, 但不必与相关学科合作或整合。跨学科研究与多学科研究密切相关, 但学科之间在方法和合作上不存在相互的转移, 而多学科研究有不只一个其他学科审视同一个特定课题。跨学科研究在学科关系上也不同于学科间研究, 因为在跨学科关系中学科界限是交叉的, 但在技术或观点上没有交流, 尽管有建设性的合作, 但在学科知识上各自展现自己的学科知识, 而学科间研究对各有关学科的操作和假设是根据集中力量解决某问题加以整合的, 并按这个原则分组, 其中可能以某一个学科为主 (Stein 2007, Wikipedia 2012)。跨文化研究范式 (Crosscultural approach) 比际文化研究更为深入, 体现文化交互和融合, 求同存异, 激发文化移情 (empathy), 同时也主张以“他者”眼光审视自身。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无论是文化间性研究, 还是跨文化研究, 都由于缺乏对于文化系统的整体性把握, 使得跨文化研究流于表层, 而显得碎片化, 无法窥见文化冰山之全貌。

应该说, 超学科性 (transdisciplinarity) 是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 它把传统跨学科合作的旧形式与科学复杂性世界观所塑造的知识和文化统一的新追求区分开来, 其动力源自对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的需求以及对新知识的追求。超学科的目的是通过整合学科和非学科的观点, 获取整体系统性知识。超学科性的概念最早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 (Piaget 1972) 提出的。Jantsch (1972) 在讨论教育创新系统时, 建议用系统理论来研究如何进行知识重组, 使之成为分层目标导向的系统, 这个协调框架理论基础就是一般系统论和组织理论。他把系统分为 4 个层次: 目的层次 (意义、价值)、规范层次 (社会系统的设计)、实用层次 (物理技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 和经验层次 (物理无生命世界、物理有生命世界、人类心理世界)。Gibbons 等人 (1994) 认为, 超学科研究对相关的认知

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基础进行重新塑造,从一开始就考虑在塑造研究活动时应用的情境,而且是连续的、动态的。因此,从根本上来说,超学科不是工具意义上的一种方法,而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一种态度或世界观。

于硕将转文化路径 (transcultural approach) 或转文化视野 (transcultural perspective) 发展成为“转文化交叉场”(transcultural cross-field) 和“转文化生成性”(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从全球历史和文化发展的高度,应用于中欧文化交流的场域,富有创见。于文通过转文化路径的应用,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大大提升了一步,出入于宏观系统和微观生活之间,第一次系统地分析和展示了500年以来复杂隐晦、爱恨交加的中欧相逢的历史画卷及其象征意义,有助于我们解读全球社会的种种冲突或联合,并理解人类关系的演变和人类共同体身份建构的必要性。

因此,转文化路径已经不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抑或是一种文化世界观,具有整体和系统性特征,基本概括了目的层次(多元超越的文化价值观)、规范层次(人类伦理的礼仪重构)、实用层次(世界社会的现实治理)以及经验层次(唯一人类共同体的生成性认同心理)等四个贯穿认知和社会实践的系统层面,具有超学科性研究特征,而不是文化间性或是跨文化研究的观点。“转文化路径”对于理解和分析当代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文化形象和中欧文化互动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参考价值,对于全球世界的和平治理更具有精神的和实践意义。

## 参考文献

- Abad, Karen Lesley Jacob. 2013. 'A Transcultural Approach to EIL in Secondary Education: A Case Study' (PhD disserta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Spanish, Modern and Classical Languages, University of the Balearic Islands).
- Brady, Alan and Shinohara, Yoko. 2000. 'Principles and activities for a transcultural approach to additional language learning'. *System*, Vol. 28 (2): 305-322.
- Erikson, Erik. 1985. *Childhood and Society*, 35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NY: W.W Norton.
- Gibbons, M., Limoges, C., Nowotny, H., Schwartzman, S., Scott, P. & Trow, M. 1994. *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 London: Sage.
- Halliday, M.A.K. 2007. 'On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In J Webster. ed. 2007. *Collected Works of M. A. K. Halliday (Vol. 9): Language and Education*. London: Continuum.
- Hult, F. 2010. 'Theme-based research on the transdisciplinary field of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In F. Hult. ed. *Directions and Prospects for Educational Linguistics*. Dordrecht: Springer.

- Jantsch, E. 1972. ‘Towards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in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 In L. Apostel et al. eds. *Interdisciplinarity: Problem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Universities*. Paris: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and Center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RI): 97–121.
- Kramsch, C. 1998. *Language and Cul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icolescu, Basarab. 2002. *Manifesto of Transdisciplinarity*.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Nicolescu, Basarab. 2010. ‘Transdisciplinarity: P2P Foundation’ . 21 December, <http://p2pfoundation.net/Transdisciplinarity>.
- Piaget, J. 1972. ‘Epistemologie des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ires’ . In CERI ed. *L’interdisciplinarite: Problème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dans les Universités*. UNESCO/OECD, Paris : 131–144.
- Remmers, Arno. 2014. ‘Transcultural Approach to Positive Psychotherapy’ . Information about a lecture delivered on 22 January at 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arsaw, Poland.
- Stein, Zachary. 2007. ‘Modeling the demands of interdisciplinarity’ . *Integral Review* (4): 91–107.
- Tochon, F.V. 2013. *Signs and Symbols in Education: Educational Semiotics*. Madison, Wisconsin: Deep University Press.
- Yu, Shuo. 2015. ‘Universal Dream, National Dreams and Symbiotic Dream: Reflections on 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in China–Europe Encounters’ . *Journal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Vol. 1 (1): 49–87.
- 于硕: 2015.《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 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全中国比较研究》, 第1期。

**沈骑教授** (SHEN Qi), 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曾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副教授, 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 (RCFLS) 副主任, 他的研究兴趣有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 语言社会学, 教育语言学与比较教育学。他致力于从政治学、文化学和社会学多视角研究中国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 他曾经提出一个融政策过程、政策内容与政策价值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 用以比较和分析东亚国家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全貌。目前他正试图开展教育语言学的超学科范式研究。

[参考文献]

## 寻找“转文化性”的生存空间回应沈骑<sup>1</sup>

于硕

**提要：**本文从 transcultural 一词的中文翻译开始，回应沈骑对此前发表的长篇文章<sup>2</sup>的评论。文章综述了“跨文化”概念的翻译和研究现状，陈述转文化性的特点，介绍人类学、汉学及拉丁美洲诗人的转文化研究成果。鉴于全球化加速与国家主义、社区主义回归的悖论，带着人类处于转文化的现实之中却拒绝接受它的困惑，作者提出了三点具体建议，跟随思想大师进行转文化知识建构，并把这一努力视为带着人类同情心的转文化生存空间的开拓。

**关键词：**转文化性，知识共建，生存空间，F. 奥尔蒂斯，命运共同体

从历史人类学角度论述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我的这篇文章（于硕 2014）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得到沈骑博士有价值的评论。我从1992年撰写博士论文时开始，就借用“阈限理论”中的“过渡仪式”(Turner 1996: 95-97)来思考中欧相逢中的转文化

<sup>1</sup> 我要说明的是本文是一个集体智慧的成果。除了《全球中国比较研究》团队对英文所做的认真修改和润色，我要特别感谢著名人类学家和汉学家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教授的指导，建议我阅读汉内兹(Uif Hannerz)、安乐哲(Roger Ames)、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劳埃德(G.E.R. Lloyd)从人类普世观出发进行的研究，这些杰出的学者都已经在他们的研究中触及了我们所谓的“转文化”思路。我要感谢马丁·阿尔布劳(Martin Albrow)教授的赞词和鼓励，他建议的新题目更能够展示文章的主旨和愿望。还要感谢巴黎政治学院吉尔·德拉科瓦(Gil Delannoï)哲学教授，他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想法。还有全球中国学术院助理研究人员及翻译潘德刚先生(Nick Prendergast)对英文稿的修饰，以及南京师范大学郭爱民教授和我的挚友廖萍萍对中文版的统校。

<sup>2</sup> 英文见 *Journal of China 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Vol. 1, 2015。中文见《全球中国比较研究》2018年第1期。再次发表此文于《社科汉语研究》2022年第1期，旨在作为翻译部分的另一篇文章的参考文献，请读者结合前面的参考文献阅读。

主体，并提出了“转文化交叉场<sup>1</sup>”(champs croisés transculturels)等一系列工具性概念(Yu 2001)。我有过两次相逢知音的喜悦。

第一次是在1999年，我第一次向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描述了中欧三次相逢和“转文化交叉场”，得到了先生的肯定，两天后他在一封电邮中告诉我：

“昨天在教科文的会议<sup>2</sup>上，我介绍了你的转文化路径，不只是作为一种观察和分析方法，也是一种伦理打赌(pari éthique)，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提问：为什么我们不能彼此成为兄弟？你创造了‘转文化相逢交叉场’的概念，我们可以把它视为近代以来普世人道主义精神脉络的继续，例如蒙田对食人族的理解，孟德斯鸠‘我们能否成为波斯人？’(Comment peut-on être persan?)的提问。还有今天的许多世界主义者，如曼德拉、艾梅·塞泽尔(Aime Césaire)、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雷蒙·潘尼卡(Raymond Panikkar)……，都终生寻求文化超越，致力于人类共同体的建构。”

莫兰后来在其杰出的著作《伦理》中多处采用了transcultural的概念。他写到：“身处今天复杂的世界社会(society-world)，我们需要创造自己的转文化符号表征系统。”(莫兰2014：303)。

另一次是不久前，英国《全球中国比较研究》期刊主编常向群博士将沈骑先生的评论文章转发给我，读后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在中国有了可以一起聊“the transcultural”的人了！从语言学视角出发，沈骑认真梳理了近几十年来文化研究的四种模式，为我们勾勒出了一条学术思路不断深化的清晰脉络。

四种模式分别为：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跨学科性(crossdisciplinarity)，以及超学科性。视野不断拓展，概念工具不断丰富。在这些社会科学研究的框架下，沈骑推导出其各自不同的研究方法：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的文化并列，学科间性(interdisciplinarity)和跨学科性(crossdisciplinarity)的相互切近，以及超学科性(transdisciplinarity)的文化浸润。沈骑先生对这些术语的特征与差异一一做了描述，指出：

“跨文化研究路径(cross-cultural approach)比际文化研究(inter-cultural study)更为深入，体现文化交互融合，求同存异，激发文化移情(empathy)，同时也主张以‘他者’眼光审视自身。但是需要指出的是，

<sup>1</sup> 我曾经发表过的中文文章用的都是“跨”，从此以后都改为“转”文化。

<sup>2</sup> 莫兰先生的报告题为《七种未来教育必需的复杂知识》(Sept savoirs nécessaires à l'éducation du future)，他当时担任联合国教科文欧洲文化署主席。

无论是文化间性研究, 还是跨文化研究, 都由于缺乏对于文化系统的整体性把握, 使得跨文化研究流于表层, 而显得碎片化, 无法窥见文化冰山之全貌”。而“超学科性 (transdisciplinarity) 是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形式, 它把传统跨学科合作的旧形式与科学复杂性世界观所塑造的知识和文化统一的新追求区分开来, 其动力源自对学术研究实际应用的需求以及对新知识的追求。”“转文化路径已经不只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 而且还是一种文化研究的态度, 抑或是一种文化世界观。”

这篇评论对我无疑是一种鼓励, 也令我不敢在学术上有丝毫懈怠。尽管“跨文化”在今天几乎成了一个时髦的词, 并已经在一些领域成为一种研究对象和分析方法, 但研究成果基本上可分为三类: 一类是传统的比较文学或艺术研究, 另一类是多元社会中的语言教学、心理或病理治疗以及社会政策 (如加拿大), 第三类是跨国经商中的“跨文化”培训,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沟通, 进而能够盈利。很多“跨文化”研究都能从全球出发, 但在论述过程中却不知不觉发生概念滑坡, 回落到某种文化本质主义的静态二元比较, 或者将 inter-, cross-, trans- 三个概念混同使用, 忽略了其中不同的语义表征、思想境界和人文关怀。我们发现许多研究的结论很像联合国宪章的说法, 强调文化尊重、和平共处, 相互学习。还有少数学者, 尽管使用的是 inter- 或 cross-culture, 但的确有着转文化 (trans-) 的感觉。如 Claire Kramsch 使用“间文化域” (sphere of interculturality) 的概念指代文化相逢中建立的新属性 (Kramsch 1993), 似乎与我们的转文化性 (transculturality) 很相似。

以“跨文化” (inter- 或 cross-) 表述转文化 (trans-) 观念的还有一位特别重要的英国学者, 劳埃德爵士 (Sir G.E.R Lloyd)。在《存在、人类与理解》一书中, 他探讨了在多大程度上我们都是所属的集体表征系统的俘虏。他以跨文化方法去研究这些文化系统, 并提出了修正我们的某些习惯性预设的可能性, 进而承认我们“唯一的世界” (Lloya 2012)。

事实上, 在转文化直觉中思考最早的是拉丁美洲的作家, 如乔治·阿马多 (Jorge Amado 1971)、艾梅·塞泽尔 (Aimé Césaire 1947)、爱德华·格里桑 (Edouard Glissant 1985)。他们从文化“混血”中汲取灵感, 批判社会和文化霸权, 并整合多样化源泉创建了转文化的意识和身份表达, 虽然他们都没有直接使用“转文化”一词。稍后我会再提到他们。

不过，几乎还没有人勾画转文化知识共建的视野和转文化认同的紧迫性。尽管在1827年，德国诗人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就已经在渴望着世界文学 (Weltliteratur) 的建构。

### 沈骑对“transcultural”一词的翻译及我的赞同理由

沈骑特别梳理了上述三个概念之间的关系和研究路径，这是对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的基础性贡献。他不同意我把“trans-”译成中文的“跨”，因为在中文的习惯性翻译中，inter-culture, cross-culture 和 trans-culture 都被译成了“跨文化”。我完全赞同他的看法，并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找到三个不同的中文词汇去对译这三个不同的拉丁文前缀。

在已经发表的两篇文章的中文版中，我将“transcultural”依旧译成了“跨文化”。那不是因为我不清楚中文语境中对三个概念一锅烩的情况，而是深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对译，而是要对从文化相遇到转文化融合的过程进行命名。两个自主的 (autonomous) 文化系统的相遇，永远是人的相遇。他们远距离审视、揣测，随着时间的延长开始接触、对话、了解，相互发生作用。他们会被“镜像效应”俘获，于是文化出现了异质性 (heterogeneous)，失去了自主性。相逢是某种“第三空间” (third-space)，在那里“文化相当戏剧化地被重塑” (Prieto-Arranz *et al.* 2013)。不管是接受还是拒绝，单一文化的“代理人”注定要变成双向代理 (double-agent)。在阈限灵活性中 (liminal flexibility) 新的文化因素几乎是自动地生成着，成为相逢者的共同财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转文化高于文化。这几乎是一次哲学命名，一次人类学阐释，需要集体智慧去完成。

于是，我只是沿用习惯译法，指望用括号中的英文词注明这个“跨文化” (trans-) 与那些“跨文化” (inter-, cross-) 的思想距离非常遥远。翻译本身正是“transcultural”的探索，要求作为“阈限人”的译者拥有多元知识和超越的人文视野。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是15年前在法文语境中提炼了“转文化交叉场” champs-croisés transculturels 的分析框架。后来，在我多次的英文写作中，“trans-cultural”一词经常被英语母语使用者当成我的英文错误，改成“cross-cultural”。

我曾经如释重负地发现，英国的兰卡斯特大学于2006年成立了转文化写作和研究中心，旨在“激发创作并探索研究其理论和文化背景”<sup>1</sup>。不

<sup>1</sup> <http://www.transculturalwriting.com>.

过，从其网站介绍和内容上看，没有达到“转文化”的高度，还是在一种或另一种文化棱镜下进行多元的或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看来，三个词混用的现象不只是发生在中文翻译和中国学术界。

沈骑建议将“transculture”译成“转文化”。从区分必要性上而言，我赞成他的提议，并在没有更好的翻译之前采纳“转文化”的译法。我们在学术追求中有着明确的超越期待：超越狭隘、静止的文化主义。它在人文社会领域拥有广大的市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越是在单一学科成就显著的学者就越容易在文化主义的陷阱中难于自拔。又因为他们拥有学术话语权，事实上造成“跨学科”或“转文化”研究的巨大障碍，例如我们很难在传统学科体系中设立转文化课程，我们也几乎难于申请到研究经费。<sup>1</sup>

人们很害怕“转文化”会消解文化差别，失去身份认同的表征符号，进而失去了权利和权力的依据。我们要立即消除这种忧虑。转文化是热情的多元文化保护主义者，但不是保守的文化主义者；转文化欣赏个性之树，也显示整个森林和所有树木相互依存的命运。文化认同强化的是族群、社区、国民意识，这是历史的存在，也是正当的；而转文化认同唤醒的是世界公民、唯一人类共同体成员的意识，这是当下历史性 (historicity) 使然，成为我们的时代课题，即建构“世界社会”自身独特的表征符号系统 (system of representation)。转文化致力于研究多元文化与转文化之间的相依为命的关系，而非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转文化视野正是始于冲破各种藩篱的生存经验，超越国家民族，超越宗教束缚，超越学科局限。带着“文化资本” (cultural capital) 和对“他者”的好奇，人们在家中相逢，在路上相逢，应邀作客。正是那个“强大的生成器”——“惯习” (habitus) 赋予了人们一种随遇而安的“实践感” (practical sense, Bourdieu 1980: 88)，让相遇的人们索性一起建构这个新的生存空间的意义、价值和信念。

如同马提尼岛 (La Martinique) 诗人爱德华·格里桑，他既提出了安的列斯性 (antillanité) 和克里奥尔化 (creolisation) 概念，也提出了“整体世界” (tout-monde) 的概念，以此批评“世界化” (mondialisation) 的概念；以“关系认同” (identité-relation) 修正“寻根认同” (identité-racine)。他在《诗性的多元》 (Introduction à une poétique du divers) 一书中写到：“我使用了德

<sup>1</sup> 在此我需要特别感谢香港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为我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天主教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提供了院长基金。在超过百年时间里，村庄里先后有 23 位法国和比利时神父担任村庄的本堂神父。该村是跨文化相逢和转文化建构的有趣案例。

里达的术语‘解构’，通过书写克里奥尔语解构法语。这一‘克里奥尔化’伴随着的是克里奥尔语的解放”(Glissant 1995: 40)。而这些文字是写给：

“任何一位有思想的人，无论他属于哪个学科领域。他们正在构想着我们的空间（群岛，坚实的山麓和广袤的陆地），正在痛苦地寻找更肥沃的思想田园、更精确的表达和更真实的艺术……。让这些文字在这里或那里垂直 (verticalities) 浮现，去保持克里奥尔身份，并同时坦荡地宣布，我们就是从这里打开通向世界和自由的道路。”(Glissant 1995: 75)

### “转文化”特点归纳

“超”字很容易导致误读，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转文化”的特点加以说明。沈骑已经十分全面地将转文化路径概括为“四个贯穿认知和社会实践的系统层面：目的层次（多元超越的文化价值观）、规范层次（人类伦理的礼仪重构）、实用层次（世界社会的现实治理）以及体验层次（唯一人类共同体的生成性认同心理）”（沈骑 2016:122）。我认为：

1. “转文化”不是走出文化，而是在各文化之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多重文化认同。
2. “转文化”不是进入宗教，而是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表征符号、不同政治体制、不同个人生命体验中，找到超验 (transcendental) 共鸣的生存空间。
3. “转文化”是人类普世价值的体现，因而如沈骑所说是一种世界观。人类经验的共性远远多于文明发展中出现的差异性。
4. “转文化”是思维工具和认知路径，通过对人与人相逢的的微观“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格尔茨 1999)，呈现全球化过程中不断生成的知识成果。为此我们需要提供分析理论和一套适用的概念工具，诸如：相逢交叉场 (cross-field of encounter)、双向代理人 (double agent) 或文化间代言人 (agent of inbetween)、转文化身份 (transcultural-identity)、阈限灵活性 (liminal flexibility)、距离原理 (principle of distance)、主动误解 (proactive misunderstanding) 等等。就中国比较视野研究而言，汉学家们的研究和他们本身是转文化性的生动体现。
5. “转文化”是一种阈限转型 (liminal transition) 的沟通磨合，具有

建构、理解和阐释复杂信息的组合性 (compositionality) 和生成力 (generativity)。不同的自主文化系统在相逢的过程中, 融合成异质的、相互包含的“自系统”。如同其前缀 trans- 所暗示的, 它将我们带入到形而上的层面, 进而挑战、甚至颠覆文化自主性的种种表征, 揭示人们生存其中却拒绝相互接受的悖论 (于硕 2014: 134, 143)。转文化的学术使命是去回答人类今天最重大的问题之一: 如何认识人类的共同命运并接受唇亡齿寒的“我们”?

6. “转文化”是今天人类的现实生存空间, 处于文化结构之外的非此非彼 (inbetween) 状态, 我们都是文化混血儿, 同时属于多个不同的群体, 混合家庭、跨国公司、使用多语言, 在世界上移动, 通过互联网与世界共时沟通。它既是自由的又是脆弱的, 面对文化主义、民族国家主义, 以及利益主义的三重夹击。互联网是一个典型的虚拟转文化“第三空间”, 其巨大能量既令人惊羡又令人惊惧。它塑造着形形色色的转文化的“部落”, 有全球伦理运动, 也有全球恐怖主义联盟。还有貌似“转文化”的逢场作戏, 比如陈光标的国际慈善, 阿里巴巴美国上市, iPhone 在其全球血汗工厂门前对“社会责任”的鼓吹。

不幸的是, 我们的世界正呈现一种在国家主权标签下的退缩: 中国梦体现为“中国特色”的构建, 与美国争霸世界和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的圆梦; 国家恐怖主义例如叙利亚打出“伊斯兰国”的国旗, 将“留下并扩张” (remaining and expanding) 作为座右铭; 俄罗斯在加剧乌克兰敌对局势, 试图恢复沙皇帝国, 与中国和朝鲜结盟, 给世界造成疑惑甚至恐惧, 是否将出现新的冷战或第三次世界大战?

教科文组织 2014 年哲学日的愿望是: “人们聚在一起, 讨论交流, 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因为在这个争战频仍的时代, 哲学是对世界和平的唯一希望”<sup>1</sup>。我觉得这还是一个世界现实下有限的跨文化方案, 它没有勇气提出在国家及文化之上展开世界社会共建的转文化思考。

为了人类的存活, 我们需要唤醒转文化的使命感。W. 韦尔施在 1997 年发明了“转文化社会” (transkulturelle Gesellschaft) 的概念, 它适用于我们中的每个人, 不分国籍肤色, 不论居住何方 (Welsch 1999: 194-213)。转文化重塑着我们的世界观, 开启人类共同体成员认同的大门, 继而生成新

<sup>1</sup> <http://en.unesco.org/events/world-philosophy-day-2014>.

的世界和平的力量。

### 沈骑的评论激发了三个想法

1. 动员中国和欧洲翻译界开展对上述三个西文概念的词源、发展和转译中文做“深描”研究。

概念翻译本身就是文化相遇，伴随着出发文化和到达文化的语境转译，其中必然发生意义的遗失和增值。时间跨度2000年，穿越了古罗马的希腊化，拉丁文的地方化，法文的欧洲化(lingua franca)，英文的本土化和国际化；在文化移植中，发生了西语在中国的翻译，从400多年前的利玛窦开始，其中有粤语、台湾的不同译法……。历史人类学者看得眼花缭乱，趣味横生。我们也希望语言学者能从转文化的地平线上感受愉悦。

这是从孤立的单一文化到融合的转文化的研究路径梳理，是逐级上升的。第一步，回归原点了解各传统文化。第二步，从单一文化（一种神话，因为没有任何文化是单一的）的棱镜中梳理文化的演变和相互之间的互动借鉴（如同多元的、文化间的，跨文化的研究通常所做的）。第三步，在转文化的框架下研究转文化生成性如何在各文化源泉的滋润下发生，并总结提炼新生的第三文化。

这一研讨可以被视为一次“转文化”知识共建的实验。我们的超学科合作网络横跨欧亚大陆，经验丰富<sup>1</sup>。在第一阶段，可以学习维基百科的方式，动员广大双语网友集思广益，贡献各自的中文翻译，参与这一民主化的知识建构；在第二阶段，组织专家进行梳理，撰写研究论文；在第三阶段举办研讨会，形成学术成果，然后以不同语言出版，这将是转文化探险的新起点。

2. 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建树上，追溯“转文化”理论的概念和方法源泉。

我们需要回到 *tranculturation* 的概念，作为出发点去勾勒转文化理论的建构过程。事实上，很少有人注意（在中国大概至今无人知道），古巴人类学和民族学家费尔南多·奥尔蒂斯·费尔南德斯(Fernando Ortiz

<sup>1</sup> 有设在法兰西研究院人文学院(ASMP)的中欧社会论坛，它的“多语言、多元社会与转文化”研讨组的成员中有著名的香港语言学家陈瑞端和巴黎汉学家白乐桑(Joel Bellasan)，有伦敦以常向群博士带领的全球中国学术院和《全球中国比较研究》强大的“转文化”团队，有中国大陆沈骑这样拥有概念趣味的语言学专家，还有香港理工大学朱志渝教授主持的翻译研究中心，以及我负责的中欧对话中心和任教的中文及双语系。

Fernández, 1881-1969) 早在 1940 年发表的《古巴复调》中, 就提出了 trans-culturation 的概念(我在这里暂时译成“超化”)。奥尔蒂斯很有说服力地证明了, 尽管古巴进入了外国开发的极具破坏性的长期过程, 但烟草和蔗糖却已经获得了潜在的自主性和总体财政优势, 这曾得益于他称之为的“文化的汇聚”(converging cultures)。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可逆过程开始了(Ortiz 1995 [1940])。

在这项研究中, 他用“超化”这个向上转化的动态化词汇来描绘非洲—美洲—西班牙文化之间的互动整合和内在关联, 考察多元自主文化体系相逢的“超化”过程。与传统人类学忽视历史和移动的倾向不同, 我们十分重视空间中的时间流动。在这样的视角下, 我们看到, 1940 年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时期, 南美及其他地区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如火如荼, 这个“历史性”促使 F. 奥尔蒂斯去建构反殖民运动中的身份认同象征——一个转文化的古巴民族。马林诺夫斯基赞扬他为人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 马林诺夫斯基谈到他更喜欢“超化”这个概念, 与之相比, “涵化”(acculturation)“听起来像呃逆和打嗝的交替”, 所表示的更多的是单边的文化变迁。而正如奥尔蒂斯的研究所证明的, 超化是一个给予-回馈(give-take)的机制, 在这一过程中, 一个被改变的、复杂的新现实得以浮现。这个现实不是一个机械的结块, 甚至也不是一个马赛克, 而是一种新的现象, 原创的, 独立的”(Navarrete 2000: 15)。

奥尔蒂斯被称为继哥伦布和亚历山大·冯·洪堡之后的“第三位美洲发现者”。他颠覆了弱小民族向强大民族“文化涵化”的观念, 从借用文化及其多重影响开始了转文化民族身份的探索。他是当之无愧的转文化路径的开拓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他发明的概念几乎被人类学界忽视了近半个世纪, 尽管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对其高度赞扬并为之作序。

近 20 多年来, 情况喜人, 他发明的概念已经流传开来, 对此特别有贡献的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 她在游记研究中采用了“超化”概念。带着批判的眼光, 普拉特将游记视为一种“帝国的意识形态装备”(ideological apparatus), 将其与欧洲自 18 世纪开始的经济和政治扩张相联接, 并分析如何通过公众的游记阅读而发生超化(Pratt 1992)。

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相应的概念: transculturation (Ortiz 1940), transnationality (Hannerz 1996), transculturality (Welsch 1999, Yu 2001a, 2001b), transnationalism (Duara 2002), transculturalism (Dagnino, 2012, Wilson 2012), translingual (Prieto-Arranz *et al.* 2013), transculture (<http://transcultures.be>).....。

这些概念在不同语言的人类学及其他领域的研究中交替出现，构成了丰富的转文化分析的概念工具 (concept tools)。

因此，我建议成立专门的研究团队进行整体研究 (holistic study)，从单一文化的研究开始，经由多元文化、跨文化研究，最后到达转文化研究。这可以为我们的全球化了的 21 世纪提供所需要的新的文化研究理论，例如转文化人类学。

3. 进行转文化个案研究的研究，包括汉学研究中的成果，组织中英法三语的著作翻译和系列丛书出版。可以进一步突出《中国比较研究》杂志的转文化定位，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研究中国，分析作为世界的组成部分，而非“中国和世界”话语下的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复杂的身份认同。

瑞典著名人类学家乌尔夫·汉内兹 (Ulf Hannerz)，针对冷战结束后的全球流动，提出了“超国界性” (Transnationality) 的概念。他的研究涉及到城市人类学、媒体人类学和超国界世界主义进程。相关的著作有《探索城市》(*Exploring the City*, 1980 年)、《文化复杂性》(*Cultural Complexity*, 1992 年)、《跨国界链接》(*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1996)、《外国新闻》(*Foreign News*, 2004 年)，以及《人类学的世界》(*Anthropology*, 2011 年)。汉内兹在其《流动，边界和杂交：关键词超国界人类学》中，提出了当今世界人类学研究的三个关键词：流动 (flow)，边界 (boundary) 和杂交 (hybridity)，并建议梳理其他相关的重要词汇。他提到雷蒙·威廉斯的书，《关键词：文化与社会词汇表》(*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Williams 1976)。汉内兹写道：

在这本小书中，“威廉斯探究了二十世纪话语中最核心的百余个概念，将其置于它们的历史积淀的复杂性之中”。“我们感到有趣的是，二十多年前，‘全球化’这个词并不在他的关键词汇中。也许，我们可以使我们的路径朝向威廉斯的选择，例如，取用‘文明’、‘帝国主义’、‘人性’、‘媒体’和‘传统’等词。如果他活到现在去修订自己的书，可能会将‘全球化’放入他的关键词中”。(Hannerz 1997: 7-39)

著名汉学家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 以中国现当代史为研究对象，运用“超国界” (transnationalist) 历史观研究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他指出不应该只从独立国家实体的角度去研究历史，而是要将其视为更广泛的，全球和区域的环流和互动过程。他向我们展示的是近代以来，神话、宗教

、国家和社会这些中国概念如何被外部力量影响和重新塑造，而这种内部实践本身又如何塑造了外部冲击。“走向世界”的全球进程其实变成了中国唯一的发展远景。在其《中国国家形塑中的全球和地区》中，针对中国的崛起，他敏锐地指出，中国不是单纯地要变成一个新霸权，而是在通过许多知识分子的努力，试图从其历史的和超越的普世性中汲取灵感，例如“天下观”，从而呈现给世界一个更公正的和有“感染力”的形象 (Duara 1995, 2002, 2009)。

安乐哲 (Roger Ames)，兼哲学家和汉学家于一身，虽然并未使用“超”(trans-) 这一词语，但我觉得他就是一位杰出的“转文化”学者 (transculturalist)。正如我们所知，很多中国内外的文化主义者都乐于否认普世价值，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是如此特殊，没有被普遍化的可能性。避开道德纯粹主义、国家例外和文化的不可通约性，安乐哲在致力于寻求一种平衡、强调早期儒家学说独特性的同时，告诫读者将遥远过去的属性整合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他认为，早期儒学“其本身对当今世界就具有重大教诲”，而不应仅仅被视为“过去或现在的某种西方哲学体系或风格的添加剂” (Ames 2010: 20)。

安乐哲试图证明的正是一种我们所说的转文化性 (transculturality)。他论述到，首先，所有的文化传统必须为每一个新时代和新地点而重新被“翻译”，如果它们为新的群体保持着活力和动力，如同《论语》中“温故而知新”所主张的那样。其次，儒学本身在中国经历了多次的“创造性适应”，重要的有：通过佛教引入地中海思想，后来在明末至清代接受耶稣会传教士的影响，接着是民国和共产党时代，再到今天的新儒家提供的最新配方，动员起扑朔迷离的“儒家们”和“儒学们”，在中国和在更大的世界舞台上争夺儒学的独尊地位。翻译难免对蕴涵的“韵致和因由”造成损伤，但它至少可以轻松地为严肃的著作注入新的活力，赋予它们以附加的“意义和优雅” (Ames 2010: 39)。至此，安乐哲像埃德加·莫兰一样乐观地在人类身上打赌。

针对全球化加速与国家主义、社区主义回归的悖论，带着人类处于转文化的现实之中却拒绝接受它的困惑，跟随思想大师，我们的研究主题可以有：转文化意识与文化多样性的发掘，互联网与世界公民意识的形成，转文化社会的香港与“雨伞运动”，中国的世界雄心与普世价值挑战……

## 我的转文化的日常泉源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我请教了我的丈夫方索 (François Bossière)，请这个正在西班牙塞维尔度假的法国画家帮助我解决 transcultural 的中文翻译困难。他的中文当然不足以好到提供一个合适的词，但是因为其作品语言及工具材料具有中西合璧的特色，曾被中国艺术界朋友总结出一个转文化的“方索现象”(方索 2005)。他向我说了以下颇多启示的话：

“我发现‘跨文化’研究把不同文化置于分开的两岸 (inter- 和 cross 前缀暗含的是空，江河、深谷)，而你的‘转文化相遇交叉场’ (champs-croisés transculturel de la rencontre) 显示的是磁场的引力和亲和力 (affinity)，也包括亲和力在数学和生物学上的含义。转文化好像拥有某种遥远的物种同源，或者生物化学中的亲和常数 (affinity constant)。我还可以用更直接的比喻——回声 (echoes)。文化相逢像回声，对喊和回声同时跌宕呼应，相互浸润。在无限的时间和稍闪即逝的动作中“遥远的将来与遥远的过去相遇”。你还记得精通矿物质的雕塑家罗伯特·史密森的这个句子吗？文化不是矿物质，而更像海绵。还要强调转文化在相逢中的无限创造力。创造力或生育力也是一种生物事实，分子聚合体在时间和相遇中形成，忽然有一天，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容器，就像毕加索的那句名言：‘我不找，我发现’ (Je ne cherche pas, je trouve)。最后，转文化是保留差异性的一种适应，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需要尺寸吻合但也要略有不同，这个空隙在法语中叫‘游戏’ (jeu)。这也很像桌子抽屉，抽屉和容纳它的空间不能毫厘不差，否则你就拉不动了，必须有几毫米的‘游戏’。

沈骑和拥有转文化兴趣的同仁们，让我们来继续这个需要智慧、韧力和人类同情心的转文化认同“游戏”，共同寻找“转文化性”的生存空间。

## 参考文献

- Amado, Jorge. 1971. *Tent of Miracles*. (Novel) NY: Knopf [乔治·阿马多：《奇迹帐篷》(小说)，纽约：Knopf，1971年版]。
- Ames, Roger T. 2011.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pp. 20, 39.
- Bossière, François. 2005. *Suite en Jarre Majeure*. Paris: Pacifica-Paris. [方索：《古坛大调组曲》，太平洋-巴黎出版社，2005年版]。

- Bourdieu, Pierre. 1980. *Le Sens pratique*. Paris: Les Éditions de Minuit. p. 88.
- Césaire, Aimé. 1947. *Soleil cou coupé* (Anthology). Paris [艾梅·塞泽尔:《太阳,被伐掉了颈项》(诗集),巴黎,1947年版]。
- Dagnino, Arianna. 2012. 'Transculturalism and Transcultural Literature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ranscultural Studies: A Series i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Vol. 8.
- Duara, Prasenjit. 1995.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002.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challenge to national histories'. In Thomas Bender. *Rethinking American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2009.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in China's Nation Formation*. London: Routledge.
- Geertz, Clifford. 1977.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年]。
- Glissant, Edouard. 1995. *Introduction à une poétique du divers*. Montréal: 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Montréal. pp. 40, 75.
- 1985. *Pays rêvé, pays réel* (Anthology).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爱德华·格里桑:《梦想的家園,现实的家園》(诗集),巴黎:色伊出版社,1985年版]。
- Hannerz, Ulf. 1996.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Culture, People, Places*. London: Routledge.
- 1997. 'Flows, Boundaries and Hybrids: keywords in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WPTC-2K-02. Department of Social Anthropology, Stockholm University. Published in Portuguese in *Mana* (Rio de Janeiro), 3 (1): 7-39.
- Kramsch, Claire J. (1993).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orin, Edgar. 2004. *Ethique*. Paris: Seuil, 189. [莫兰:《伦理》,于硕译,北京:三联出版社,2014年版,第303页]。
- Navarrete, William. 2000. *La Chanson cubaine, 1902-1959*. Paris: L' Harmattan. p. 15.
- Lloyd, G. E. R. 2012. *Being, Humanity and Understan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rtiz Fernández, F. 1995. *Cuban Counterpoint: Tobacco and Sugar*.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Contrapunteo cubano del tabaco y el azúcar. 1940].
- Prieto-Arranz, José Igor et al. 2013. 'Reimagining Cultural Identity: transcultural and translanguaging communication in virtual third-space environments'. In *Language, Culture and Curriculum*. 26: 1, 20.
- Pratt, Mary Louise. 1992.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 SHEN Qi. 2015. 'From cross-cultural and intercultural to transcultural studies: comments on 'Universal dream, national dreams and symbiotic dream: reflections on 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in China-Europe encounters''. *Journal of Chin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 (2).
- 沈骑 2016.《从跨文化、“际文化”到“转文化”研究:兼评〈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一文》.《全球中国比较研究》第2期。
- Turner, Victor. W. 1966.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95-97. [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95-97页]。
- Welsch, Wolfgang. 1999. 'Transculturality: the puzzling form of cultures today'. In Featherstone, M. and Lash, S. Eds. 2012. *Spaces of Culture: city, nation, world*. London: Sage. pp.194-213.
- Williams, Raymond. 1976.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Sheena. 2012. 'Multiculturalisme et transculturalisme: ce que peut nous apprendre la re-

- vue ViceVersa (1983–1996)’.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 45–46: 261–275.
- Yu, Shuo. 2001a. ‘Découverte du transculturel dans un parcours personnel singulier’. In *Etudes Interculturelles*, No, 23 (Fall–Winter). 84–90. Thionville.
- 2001b. *Discovery of transculturality in an approach of cross-fields: examples of Sino-Wester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encounters*. Université Nanterre, Paris–X. <http://www.sudoc.fr/078961084>.
- 2015. ‘Universal dream, national dreams and symbiotic dream: reflections on transcultural generativity in China–Europe encounters’. *Journal of China in Glob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Vol.1.
- 于硕：2015.《普世价值梦、民族国家梦及环球共生梦：中欧相逢中的跨文化生成性思考》《全球中国比较研究》，第1期。

**于硕教授** (Shuo Yu), 旅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曾任教于香港理工大学双语系并担任中欧转文化对话中心 (Centre for China-Europe 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 的欧洲代表，她是该中心的创始主任，也是中欧社会论坛的创始人之一并任其第一任总监。赴法国攻读博士之前曾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旅居法国三十余年，与法国画家方索 (Francois Bossiere) 结婚，从事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及教学。她一直跟随法国著名思想家莫兰 (Edgar Morin) 并将其复杂性思维 (Pensée complexe/complex thinking) 运用于中欧对话交流的实践，基于中欧三次相逢的研究提出了跨文化场 (champs croisés/cross fields) 理论。